

回望災難的歷史

——汶川大地震後讀《北川縣志》

● 熊景明

一座座刀削斧劈般的山峰，陡峭險峻，湍急的澗水溪流從山間奔出，匯流成川。川邊狹長的谷地上人煙稠密，白雲深處亦住有人家，百姓生計之艱難，自不待言。然而，地動山搖之後，山川中的百姓在大災大難中表現出的勇氣，面對傷逝的鎮定，劫後餘生的達觀，令人感動不已。愛和善意在傷痕纍纍的土地上昇華，讓我們在人性光輝之中，看到民族的希望。

北川中學五層教學樓轟然倒下，校長劉亞春立刻組織及時逃出來的師生救人。此刻，他的兒子被壓在附近另一所教學樓之下。事後鳳凰衛視的主播陳曉楠問起他死去的獨子，他說：「他的成績很好，最大的願望是考取香港中文大學。我和他有個約定，只要他考得上，我會全力支持，但要他永遠不回來。」

校長和教師都很年輕。從一位老師的「博客」中，可以看到地震前幾天學校集體運動、遊戲的照片，師生親密的關係是在大城市中學中不能想像的。救援隊在地震後十四小時才來到北川，期間，師生徒手從廢墟中救出四百多人。一位教師用肩膀頂住垮塌

的門檻，讓三十多名學生得以逃命。大地震讓我們見識了北川這些出色的教師，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學生。

面對記者、鏡頭，北川中學的師生沒有豪言壯語。回顧不堪的兩周，校長說：「開初是大悲大難，是痛苦，也是堅強和勇氣；後來就是一個字：愛。」他說：「北川中學會站起來」；但接着，出乎預料地，他勸告準備高考的同學：「好好考，考出去，能走多遠就走多遠，不要回來，心裏有北川就行了。」

地震後的第十天，「北川城最後的拉網式搜救未發現倖存者，救援部隊陸續撤出，殘存建築將爆破掩埋，這座建縣1,400多年的小城即將徹底消失。」^①感慨之餘，筆者翻開《北川縣志》（以下簡稱縣志，引用只註頁碼）^②。這個隱藏在重重青山後的小縣，竟然經歷過如此之多的罹難……

從公元803到1547年，在北川的廝殺和血腥鎮壓，是以民族大義和天朝的名義，而生命卻不足惜。那個時代人類的野蠻，反映在世界許多地方民族之間、民族內部無情的爭鬥和屠殺之中，也反映在北川的刀光劍影之中。

一 漢番之爭

連綿的高山峻嶺形成川西平原的天然屏障，「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」。

十七世紀中葉，改土歸流在北川推行，強者的橫蠻、弱者的無奈，與今天民族平等、保護多元文化的共識，背道而馳，但最起碼保住了那個時代很多人的性命。

或逃避戰亂，或尋找桃花源，南來北往的人躲進大山深處，在此安身。自古以來，北川是羌人和藏人的聚居地。秦漢之際，西北的羌人南下至此。唐初，大批吐番留居繁衍，並相繼佔領了羌人的地盤。後來，在強大的鎮壓者——漢人的官兵面前，羌人和吐番結成聯盟。漢番之間大大小小的武力鬥爭從公元八世紀連續到十五世紀。歷史記載的第一次官方大規模圍剿吐番的戰役在唐貞元十九年(803)。

到十六世紀中，少數民族對漢人聚居區的滋擾和官方對少數民族的無情鎮壓，以官方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和政策調整告終。最關鍵的征剿在1547年。明朝朝廷出動精兵九千，分三路進兵，最後大獲全勝，使羌人和吐番受到毀滅性打擊。這次征剿史稱「走馬嶺一戰」。此後，明軍動輒以武力相威脅，羌人和吐番便相繼歸附成為收知縣管理的「熟番」。

武力征服後，強制性漢化開始推行。地方官員首先便使少數民族「變易番姓，從習漢儀」，漸「與漢民一體」(頁173)。這就解釋了為甚麼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北川，到1953年人口普查時，78,000多人中只有59人申報為羌人，1,698人為藏人。然而，「1981年以後進一步落實民族政策，羌、藏族群眾陸續恢復和改正其民族成分，羌、藏族人口數迅速增加。」1987年，羌人超過50,000，佔將近三分之一人口，藏人3,170(頁147-48、163)。

從公元803到1547年，七百多年的廝殺和血腥鎮壓，是以民族大義的名義，以天朝的名義，而生命卻不足惜。名義的後面也許是爭奪地盤，對非我族類斬盡殺絕是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。那個時代人類的野蠻，反映在世界許多地方民族之間、民族內部無

情的爭鬥和屠殺之中，也反映在北川的刀光劍影之中。「墜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殫記」(頁169)，是令勝利者何其驕傲的成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現有的記錄，都是漢人所書，無法聽到羌人和吐番的記述和講述。

十七世紀中葉，進入北美的白種人和印第安人在你死我活的拼鬥時^③，中國的文明推進了一步，改土歸流在北川推行，「二百年間馴服王化，漸染華風，已大更其陋習」(頁173)。強者的橫蠻、弱者的無奈，與今天民族平等、保護多元文化的共識，背道而馳，但最起碼保住了那個時代很多人的性命。

二 革命根據地

自1795年有人口記錄以來，北川的人口變化大起大落。人口大變動的後面是兵荒馬亂、饑荒和流離失所。從縣志中可以看出，1935到1936年間北川人口減少一半，是「革命老根據地」的代價。1935年，北川人口不過50,000，紅軍來的四個月，駐軍數萬，過境的軍隊一共80,000。這麼多人的補給哪裏來？先是「打浮財」，沒收「土豪劣紳」及國民黨地方官員的財物。按當地人記憶，陳家壩鄉三個村莊共63戶人家，就有8戶被定為「土豪劣紳」，「共沒收其糧食125石(約合3萬公斤)，肥豬3頭，銅元8夾背半，衣物、用具若干。銅元交紅軍；肥豬當即宰殺，用於慶賀老楊村蘇維埃成立」(頁198)。可是，就算將八分之一的人家定為「土豪劣紳」，這窮鄉僻壤也沒有多少「浮財」。

接下來收集物資的運動稱為「打糧」，「各級蘇維埃組織游擊隊打集(收繳)地主和官倉的糧食以支援紅



姜曉明攝

軍。地主豪紳埋藏於地下和轉移至深山岩洞的糧食、豬膘也被挖找出來。……蘇維埃號召群眾向紅軍捐送糧、菜和豬、牛、羊。」存糧用盡後，開始「打嫩糧」。山區農民一年種兩季，春天種豆，待熟透、曬乾，當主糧食用。「打嫩糧」的意思是不等豆熟，收穫青豆來救急（頁200）。其後果是斷了農民一季以上的口糧。

青壯年則負責替紅軍背運物資。「紅軍離境後，大批群眾為紅軍運送糧食、武器、輜重。」（頁200）全縣當時男勞力出動3,000多人（頁11），隨紅軍西去未歸者2,000餘人；陳家壩一個運輸隊共50人，為紅軍背運鹽、布等物資，其後返回的僅10餘人。縣志記敘道：「途中處處懸崖陡坡，深澗密林，負重行走，異常艱難。」（頁200）看過北川地震的電視觀眾，多少明白箇中艱險。

紅軍於1935年4月12日入境，7月23日撤離，在北川共103天。「紅軍為了阻止川軍追擊，燒掉了北川峽谷內的幾座篾索橋，燒毀了龍鳳場徐坪壩和鴛鴦樹的未及運走的糧食，還燒毀了治城、漩坪、桂溪、龍鳳、貫嶺、

都壩、小壩、片口、壩地、白什等處街房及沿途一些大院落。」（頁195）渡河的篾索橋被毀，斷了進出北川的通路。被燒毀的治城即北川縣城，建於唐貞觀八年（634），元末曾毀於戰亂，清代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重修，到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城內建「模範馬路」。1932年，縣城城區有400戶人家，茶、旅、商店30多戶。縣志的編撰者帶着怎樣的心情，用這麼一個簡單的句子來記錄這段歷史？——「民國24年7月紅四方面軍撤離時房屋被焚毀殆盡」（頁609）。

北川和汶川文獻史志都稱大禹在本縣出生（頁698、794）。唐代以前，北川名勝石紐山建有禹廟，每年六月六日大禹誕辰，均在禹廟前祭奠，千百年來從未間斷，是北川人身份認同的標誌。明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立禹碑，高2.55米，寬1.55米。1935年，禹廟被毀，縣志編撰者只提到這一年紅軍在禹廟的石碑上刻標語，隻字未提禹廟被何人所毀（頁698-99）。縣志記載「紅軍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」（頁199），受到民眾熱情歡迎。一個紅軍接待站，晝夜不停為紅軍炒油米，兩

北川和汶川文獻史志都稱大禹在本縣出生。唐代以前，北川名勝石紐山建有禹廟，每年六月六日大禹誕辰，均在禹廟前祭奠，千百年來從未間斷，是北川人身份認同的標誌。

個多月炒製數萬公斤，供紅軍攜帶食用，孕婦也捐出自己準備坐月子用的酒釀等（頁199、200）。

當時紅軍準備創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，吃住之外，在北川開展翻天覆地的革命，迅速建立了縣、區、鄉、村蘇維埃政權，平分土地，對地主富農、商人進行無情的打擊。四個月後，川軍來了，他們聯合過去幾個月被蹂躪的富人，組織「清共隊」，開始血腥鎮壓各級蘇維埃幹部。跟着紅軍去搶浮財的人，這時也遭殃了。川軍「燒殺姦淫，佔吃罷賒，劫物拉夫」（頁203），惡行纍纍。不過三個月，分掉的土地又物歸原主，耕種的季節卻誤了。這一年的饑荒，正像二十四年後，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帶來的另一次饑荒一樣，是人禍所致。

1935年夏秋，災荒的同時，霍亂、痢疾流行，「屍橫遍地，收葬無人。……由縣府捐資造『萬人坑』二處，共掩埋城周圍骸骨三百餘具。」（頁673）1936年，北川縣長馮康寫道：「北川自遭匪後，又罹兵災，……雞犬無聲，路斷人稀」。當時，「縣內人口驟降，出現若干死絕戶、無人村」（頁204）。從1935到1936年，北川人口居然減半，這一頁慘烈的歷史，至今只能猜測個大概。

地震存活者的哭聲，令人聯想到七十多年前數萬家破人亡的北川人。

三 打倒地主富農

以革命的名義打天下，人道性命太不足道了。進入北川的紅四方面軍，聽命於張國燾，他的左傾，打着時代的烙印，不過更為過火、激進。

從縣志記載看來，紅軍來到之前的二十多年，北川已經漸漸走向由亂

到治之路。民國建立之初，這裏土匪猖獗，民不聊生。十多年後，地方政府似乎開始有所作為，以工代賑，整修道路，救助救災。1926年，縣裏設了圖書館、平民讀書處。1927年，縣農會、工會、商會相繼成立。這一年，首部《北川縣志》開始編撰，到1932年印製成書。1928年，除原來的三所小學外，還設有第一女子小學校（頁9）。到1949年有近二百家作坊和手工企業（頁477）^④。1948年，縣財政收入11億元（法幣），大約2億用於行政，4億用於教育，近6,000萬用於衛生和社會救濟（頁568）。

1950年1月，解放軍進入北川，3月即爆發一場全縣性的武裝暴亂，抵抗者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。地方農民鮮見的強烈反抗，不知是否和十五年前紅軍進入當地的記憶有關。最終，「兩次平定暴亂，深重地打擊了反革命勢力的囂張氣焰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。」緊接着的清匪運動，槍決17人；反霸運動判處惡霸53人，然後就是減租退押（頁51）。政府成立了工作團，吸收農民積極份子260人參加，每月發給大米110斤，稱「百斤米幹部」（頁343）。當時米價每100斤約6元，而人均收入每年不到60元，這些鄉村積極份子得到的補貼可謂相當可觀。

減租退押轟轟烈烈地搞了一年，同時開展反霸鬥爭，採取大會訴苦鬥爭，小會清算追繳，對個別罪大惡極者判處死刑，「打擊地主階級的威風」，也「明確了租佃關係」。最重要的是，成立了各級農民自治組織，不少地主富農還被村民推選為農協委員。當時，對大多數地富還客客氣氣地開座談會，講明政策，結果他們都「自願」繳出糧食、黃金、銀元和各種財物（頁52）。

1950年1月，解放軍進入北川，3月即爆發一場全縣性的武裝暴亂，抵抗者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。地方農民鮮見的強烈反抗，不知是否和十五年前紅軍進入當地的記憶有關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當各地村民開慶祝大會慶祝翻身，以為天下從此太平時，真正的土地改革「暴風驟雨」才開始。縣志記錄了土地改革的細節。1951年2月，162個工作隊進入村莊。頭二十五天發動群眾，建立貧僱農代表會，行使村行政權力；之後的二十天劃成分，從農協組織中清除地主、富農。第三步就乾脆沒收了地主、富農的土地、財物。「全縣共沒收、徵收土地6,525.5公頃〔佔他們原有土地的96%〕，糧食3,437.7石，耕牛776頭，房屋11,104間，各種農具2,974件，家具衣物11,223件。」（頁53-54）

接下來就是「分配勝利果實」，每人分得3、4公頃土地，地主富農分到的是壞地。山區農村好田與壞地的產量差別數倍，而且一般愈壞的地離村子愈遠。不過隨之而來的合作化運動，令土改失去意義^⑥。1952年4月8日，土地從收回來到重新分配的工作便完成了。剩下兩個藏族村的土改推行到1955年10月，也在短短三個月內大功告成。最不可思議的是沒收了房屋12,000間之多，縣志分別在兩個地方提到這一數字（頁54、614），另一處則說：「1952年4月土改結束時，全縣農村共有房屋12,300間，戶平不足一間，其中草房近半。」（頁361）

縣內13,000多戶人家中，家境比較富裕的有1,541戶，佔11.8%，他們擁有的耕地佔42.5%，不到平均佔地的四倍（頁378-79）。按許多年後的說法，這些富裕或者比較富裕一點的人家，可被稱為當時的「先進生產力」。他們中有的對租戶刻薄，甚至貪婪而不近人情，但他們的土地、房屋、財產大都是世代慢慢積累所致。尤其是「富農」，多數人屬於省吃儉用、老實巴交的農民。出租土地，並沒有觸犯法律。他們的主要罪行就是比鄰人富有。

縣志沒有記錄北川如何鬥爭地主富農，至今中國大陸的學術界，對土改的研究也極少，因此不知道全國被鬥死的地主富農有多少。被劃為地主、富農份子，不僅只是土地、房屋、財產被沒收，這些人，包括其子女甚至孫輩，從此淪為備受歧視的異類，喪失許多公民權利，低頭做人，淪為各種政治運動鬥爭的對象。1979年，北川對全縣1,851名「五類份子」進行清理，1,777人恢復社員身份，其餘74人，於1983年全部摘帽，解除監督改造（頁287-88）。

土改的影響遠遠超過地富份子及其親屬，它不僅打擊了草根階層的「先進生產力」，而且是對傳統文化的顛覆。在北川，土地在十七年內三易其主，在鄉親鄰里之間，不知造成多少新仇舊恨。北川歷來土匪為患，鄉民曾組織自衛隊抗匪。打家劫舍的土匪行徑為人不齒，而今卻在政府的號召和組織下，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，奪取他人的財產、土地，將他人趕出家門，都成為正當。所有的不智、不公、不義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強加於人，對之產生疑問是「階級覺悟低」，對之不贊同是「階級立場問題」。顛覆傳統道德，否定人的良知判斷，也為從此之後幾十年的災難，包括大躍進、大饑荒、文化大革命等等種下禍根。

在奪取政權後，以推翻舊世界的名義來建設新世界。個人的生命從屬於某種偉大的事業，在烏托邦的理想國中，微不足道。

四 大躍進與大饑荒

1958年9月6日，第一個人民公社在北川成立，以後半個月內全縣便成立了二十八個人民公社（頁25）。農民

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，奪取他人的財產、土地，將他人趕出家門，都成為正當。所有的不智、不公、不義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強加於人，對之產生疑問是「階級覺悟低」，對之不贊同是「階級立場問題」。

至今，學術界把大饑荒的成因歸納為浮誇產量、高徵購、公共食堂、勞動力離村從事修水利、煉鋼，還有雪上加霜的「反右傾」，錯過本來可以及時救災的機會。所有饑荒成因，在北川都走到極致。

歡天喜地拿到土地證不久，便沒甚麼選擇地加入合作社。1952年，還算是自己那片地的主人，兩年後被趕進初級社，土地證也還算數；1956年，高級社成立了，自家的牲口、大農具也要交出來。再過兩年，不由分說，幾天之內，那張神聖的土地證成為廢紙。最不堪的是，各家各戶的自留地也收歸集體。緊接着的一個月後，家裏的鍋碗都得交出去，糧食也交出去。1958年10月底，北川建起1,129個公共食堂（頁25）。

北川是典型的窮鄉僻壤，50年代糧食畝產平均不到60公斤，到80年代種子改良、使用化肥後也只是100多公斤，而且一半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，水土流失嚴重，幾乎每年都有災害，非旱即澇。1169至1976年間，中度到強度的地震就發生過十餘次（頁98）。

北川森林廣袤，但山高路陡，個體伐木不可能，故歷來並未給老百姓帶來多少收益。農戶自己所種的林木果樹也保不住，從1957到1982年，農民的林木所有權數次改變。1957年，全縣6.2萬公頃農民擁有的林木統統按要求折價入社，農民的自留山、柴山、自留林只剩4.1萬公頃。過了一年，這一點自留林全部收歸集體，沒有任何補償。遭如此折騰，三番五次（頁422-23）。

1958年9月，全縣調集了青壯年10,000多人，即超過半數的勞動力，再加上從外縣調來的20,000勞力，共30,000人「組成鋼鐵大軍，或伐薪燒炭，或挖煤開礦……展開『鋼鐵大會戰』」（頁58）。實際上是一場人為破壞自然的生態大災難。縣志在北川水土流失的一章，開宗明義就提到大躍進運動毀林燒炭煉鋼，即毀林開荒的惡果（頁464）。

1959年國家實行糧食徵購，從北

川收走了8,860噸糧食（頁553），超過1958年一倍以上。徵購糧有兩層內容，「徵」是農業稅的意思，「購」是賣「餘糧」，其標準是按當年的產量算出來的，即留夠農民的口糧、種子、集體支配的機動糧，其餘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強制性地「賣」給國家。徵購加倍，說明北川縣領導向上級報告的產量比上年超過一倍以上，也說明農民的口糧、種子都被拿走了。到1961年，產量不但沒有提高，反而降低了超過三分之一，只有42公斤。這一年的大量徵購，「造成農民口糧、種子不足」（頁556）。

後來雖然國家返銷糧食救濟，但已經過了播種季節。到1962年，餓死人的現象已經非常嚴重，但國家還徵購了4,165噸糧食，比規定任務超過370噸（頁553）。按政府在1956年的規定，農村的口糧標準是187斤半。北川1961年人均口糧僅92至108公斤，國家返銷口糧人均15.4至32公斤。人民「普遍以瓜菜和草根樹皮代糧充飢」（頁360）。

至今，學術界把大饑荒的成因歸納為浮誇產量、高徵購、公共食堂、勞動力離村從事修水利、煉鋼，還有雪上加霜的「反右傾」，錯過本來可以及時救災的機會。以上所有饑荒成因，在北川都走到極致。到1960年，全國絕大部分的公共食堂都停掉了，北川卻一直維持到1961年7月。

1959年8月的「反右傾」，縣志有生動的記述。縣委擴大會議在一個月中開了三次，每次八至十天，吸收縣、區、公社三級黨員領導幹部參加，對在總路線、大躍進、人民公社、大辦鋼鐵、群眾運動、政治掛帥六個方面持不同意見者進行現場揭發、批判和鬥爭。10月20日，地委召開電話會議。會後，各地連夜行動，

832名縣、區、公社幹部和42,377個勞動力在三天之內分赴兩大「戰區」、15個大「戰場」和376個小「戰場」開展「反右傾」。最後，413人被定為「有右傾思想情緒」，81人「有嚴重右傾思想」，33人是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」（頁61）。換言之，八百多名地方幹部中，超過一半人曾經多少說了幾句真話，於是就成為鬥爭對象。今天，沒有經歷過如此場面的人，不容易想像鬥爭會的恐怖場面。

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，縣志將與大躍進和大饑荒相關的史料分別放在不同的章節中，同時幾乎沒有具體的描述。在大事記中提到「1961年2月13日，因嚴重缺糧，出現群眾到回龍公社馬鞍山挖食『觀音土』（白泥）事件」（頁28），但在人口狀況表中可以看到，在1955至1973年之間，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長率是千分之30左右，而1959、1960年分別是負的千分之10.6和14.4（頁147）。兩年內人口淨減少5,000多人，統計是否準確，不得而知；到底餓死多少人，不得而知^⑥。

以多、快、好、省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，「唯有犧牲多壯志，敢叫日月換新天」。

五 結語

北川地處龍門山斷帶，大小地震經常發生。縣志記載，「1977年4月，縣境正式列入地震八烈度設防範圍」，之後幾年，政府曾撥款給一些辦公樓及公共建築進行加固（頁616）。從汶川大地震後的北川看來，當地的建築，尤其是學校，離「地震八烈度設防」實在太遠。地震帶來警覺，也帶來啟示。現代傳播手段讓生命消失的殘忍，讓倖存者撕心裂肺的

哀慟在大眾面前展現。與過往的災難不同，這一回，死亡不僅僅是個數目字，每個催人淚下的故事都讓人領略生離死別的含義，喚起世人對生命價值的認識。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將載入史冊。不可忘記的是，5月30日，成都賑災晚會打出了「以生命的名義」的旗號。

人類曾經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殘殺；以種族的名義，乃至後來以革命的名義，舉起武器對準同類。在二十一世紀，以生命的名義回望歷史，並非算舊賬，而是明白在付出慘痛代價之後，才確立了共建和諧社會的目標。和世界上許多民族一樣，中國人也是這樣走過來的，走到尊重個人生命的今天。終於，我們可以告慰千百年來多少冤魂，多少被踐踏的生命了。

人類曾經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殘殺；以種族的名義，乃至後來以革命的名義，舉起武器對準同類。回望歷史，並非算舊賬，而是明白在付出慘痛代價之後，才確立了共建和諧社會的目標。

註釋

- ① 《南方都市報》，2008年5月26日。
- ② 北川縣志編撰委員會編：《北川縣志》（北京：方志出版社，1996）。
- ③ 加拿大政府於2008年6月公開為1887到1976年，對原居民的強制同化政策道歉。
- ④ 1971年，全縣也僅有工業企業85家。參見《北川縣志》，頁478。
- ⑤ 有關論述，參見張鳴：〈華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運作（1946-1949）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（香港中文大學·中國文化研究所），2003年4月號，頁32-41。
- ⑥ 按楊繼繩的研究，四川省大饑荒餓死的人數在1,000到1,200萬之間。參見楊繼繩：《墓碑：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公司，2008），頁222。

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顧問